

第四章 苦心孤诣,经营打造 独立王国

阎锡山自从执掌山西军政事务后,就一直把这里视为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不容外人覬覦、涉足。他不但将大权揽于一身,对军政事务以至经济、社会事务经常过问,而且对内外人等防范甚严。一旦发现异己之人,不是杀掉就是排挤,必欲除之而后快。正是凭借着自己那一套别出心裁的“统驭术”和“监控法”,阎锡山才得以稳据三晋之地,独霸山西,历30余年而不倒,甚至连“军事强人”蒋介石也拿他没办法。

一 谋杀孔庚——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孔庚,字文掀,湖北浠水县人,清末秀才,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回国后,他先在清陆军部实习,旋担任该部科长职务。1911年辛亥革命,孔任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的参谋。吴被刺死后,孔即转入山西,赞助民军。不久,娘子关被清军攻占,阎锡山放弃太原,向北逃走。孔庚闻知,追至五寨,认为阎轻易放弃太原为失策之举,即向阎建议,向北路进军,继续与清军作战。阎即任孔为北路军总司令兼朔方兴讨使。

当阎锡山由晋西北转入包头后，清绥远将军埒岫派兵进攻，阎派统带王家驹率队出发抵御，双方交战于刀石村，王家驹阵亡。清军也因援军不至，不敢恋战，旋将托克托城放弃。这时，孔庚向阎锡山建议，趁机进攻归绥。不想阎锡山已接到清巡抚李盛铎来信诱降，决心返省，不主再战。孔不得已，随阎南返。1912年4月，阎锡山投靠袁世凯，回到太原，重任山西省都督。接着，部队整编，孔庚被任为山西陆军第一师师长；不久，又改任为第九师师长，授陆军中将衔、二等文虎勋章；袁世凯称帝时，又被封为三等男爵。

辛亥革命后，山西管辖地区北至内蒙古河套。孔庚所属部队，驻防大同至包头一带，孔庚本人“坐镇”包头；其参谋长李勉（云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驻大同。驻大同的军队，只有一个第五团，后改为三十五团，团长吴信芳（安徽人）。

驻包头地区的部队，有两个旅，旅长为刘樾西、张培梅。团长为赵守钰、倪普香、台寿民等。此外，师又直辖骑兵团一，团长张树帜（后来驻大同），炮兵团一，团长高永胜，还有工兵、辎重各一营，机枪一连。

辛亥革命后，塞北地区（俗称口外）的封建农牧大地主为了保护自身的财产，招兵买马，各据一方，因之交通阻塞，商业凋敝；而该地区的商业又多为山西人所经营，他们对山西省的税收和军饷，负担着相当大的数量，所以，阎锡山配置重兵于包头地区。当时该地区秩序混乱，反对袁世凯和阎锡山的人很多，还不断有复辟的谣言到处传播。为了镇压当地群众，阎锡山令孔庚“坐镇”包头。

自孔庚驻防包头后，经常派遣步骑炮联合部队四处出动，经过若干次的大小战斗，终于将塞外的交通秩序大部恢复，沿途商旅络绎不绝。从此，孔庚之名威震塞北。这时，孔庚为了巩固所

属防区，特与宁夏护军使马福祥、阿拉善旗塔王结为盟兄弟。

1914年春，孔庚由包头经大同前往北京“觐见”大总统袁世凯。袁当面嘉奖说：“西北一带防务，就靠老弟啦！”孔在北京，还和副总统黎元洪以同乡之谊，暗中联系，并带回同乡与旧同事多人，安插到他的部队里。这就引起阎锡山的莫大疑忌。

当孔庚从北京回到大同时，大同市面悬旗结彩，火车站上布置得更为热闹。最引人注目的，除放列山炮两门外，还临时由大同神机武库取出清朝的武器——二人抬炮多尊，炮手多人，作为礼炮队。当孔庚下车时，乐队奏乐，礼炮齐放，孔庚向欢迎者答礼后，入城暂住，不久又返包头。这时孔已改任为第九师师长。

1914年夏某夜12时，突有变兵一部，持枪袭入孔庚司令部，并冲进孔的办公室。该变兵在煤油灯光下，瞥见床上睡有一人，当即开枪猛射，旋即大声说道：“师长已被打死啦，快快退走！”

原来被打死的乃是孔庚的一个亲友，刚由湖北来，在孔的办公室休息，被变兵误认为师长，当场毙命。而孔庚本人却在另一个房间休息（当时孔的妻室在太原），他在睡梦中被惊醒，潜伏于办公桌案下，始免于难。

次日拂晓，查明昨晚变兵出自驻包头的骑兵第二营八连。孔庚不动声色，声言变兵已逃后山，将即派队缉拿；并令八连官兵携带绳索，到师部领取军用品，准备出发。与此同时，孔庚又另调亲信部队埋伏于师部院内及附近。当八连官兵进入师部后，伏兵四起，一一被执。孔庚当即举行军法会审，讯明当晚参加兵变者有20余名。孔即提起朱笔在此20余人的名单上标直道者杀头，标圆圈者枪毙。在审讯中，孔发现案情复杂，不便深追；对旅团长等军官，又不好深加责斥，乃又归罪于师部卫兵警戒疏忽，旋将卫兵司令续敦礼用铡刀铡死。这就是当时所谓“包头兵变”的概略情况。这次兵变的幕后主使人，原来就是阎锡山。他

为了排除异己，便暗中指使张培梅等发动“兵变”，意图杀死孔庚。不意这个阴谋没有实现，但也造成了打击孔庚的一个借口。包头兵变后，阎锡山即借词说孔庚“统御无方”，再加上其他原因，将孔庚的第九师缩编为第十三混成旅，降孔为旅长。阎又怕孔庚不安于位，便又令其兼任晋西镇守使的名义。不久，袁世凯政府将热河、绥远、察哈尔划为特别区，孔庚又被调为晋北镇守使，回驻大同，所部十三混成旅，又被缩编为第一混成团。

这时，阎锡山已改任为同武将军。为了削弱孔庚的实力，他亲到大同，设立同武将军行署，监视孔庚缩编部队，处理大批编余官兵毕，才又返太原。

孔庚改任晋北镇守使以后，在大同城北之卧虎湾修建大营盘，改建前清总兵衙门为镇守使公署，重修孔庙和关岳庙……孔在关岳庙大殿上悬挂一面匾，上书四个大金字：“兵何以精”；在孔庙东西两侧牌坊上，一面题写“精忠贯日”，一面题写“义薄高云”。

1915年双十国庆日中午时分，孔庚以八抬大轿，将孔子牌位置于轿中央，他本身身穿古祭服，鼻梁上戴着深茶色眼镜，坐在牌位后，轿前排列有军乐队和民间鼓乐配奏，轿后随行的官员很多。当时大同市民都投以惊奇的眼光，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是孔庚以孔子后裔的资格“祭孔”。

同年冬，口外独立队卢占奎全部由平鲁县北长城七墩口进入山西，声势浩大。孔庚闻报，急率步骑炮兵前往堵击，行至朔县冠庄村开火。在战斗中，孔部获得人红帅旗一面，上书“塞北督抚招讨兵马大元帅虎威大将军卢”。接着，卢占奎部又由朔县转入山阴、应县、浑源、阳高等县境，孔庚亲率骑兵一营尾追至阳高县之大北庄，稍有接触，卢部略加抵抗，即由镇门堡退出口外。孔庚方率部返回大同。

孔庚返回大同后，正是袁世凯准备坐皇帝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孔庚与雁门道尹邹道沂（山东人）结为盟兄弟，秘密进行反袁活动。这时，宁夏护军使马福祥、内蒙古阿拉善旗塔王，也应孔庚之邀来至大同，共商讨袁大计。同时，孔庚还派镇署差遣金某（回族）到口外收编卢占奎部，加入讨袁行列。

孔庚和外部联系好以后，便召集本部营长以上军官商讨扩编部队，准备发兵讨袁。会后还集体摄影，作为纪念。同时，孔庚还和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绥远都统张绍曾暗中约定，待时机成熟，即行宣布独立。不想这事竟被部下——第一混成团团长乔煦和参谋长张楠等人向阎锡山告密。

阎锡山闻讯，一方面令骑兵团团长张树帜派兵把守大同各城门，并在火车站上布满岗哨，严加戒备，以防孔庚异动；一方面又派赵戴文星夜前往大同，接替孔庚的镇守使职务；同时调孔庚回太原任同武将军署参谋长。孔庚晓得反袁计划已被泄露，只得向赵戴文办理交接手续。不料第三天头上刚刚交代完毕，阎锡山又电令赵戴文仍回太原，另委南桂馨代理晋北镇守使职务。第五天头上，孔庚在一个骑兵连“护送”下，由大同起程，前往太原。及至到达太原北门，已夜晚12时，城门卫兵不予开门，孔庚只得等到次日天亮以后，方入城到将军署和阎锡山相见。阎锡山令孔庚单独居住一处，形同软禁。这时，孔庚痛哭流涕自言自语地说：“我们把清朝皇帝推倒，不想袁世凯又要坐皇帝，我反对他，又有何罪！”

1916年6月，袁世凯逝世，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所有“帝制犯”恢复原职。7月，孔庚又回任晋北镇守使，马上将第一混成团团长乔煦撤职，由李勉接任；镇署参谋长也由张华辅（湖北人）接替了张楠。这时，反孔的谣言又起，说孔尽用湖北同乡，别有用心……接着，旧历年刚过，驻大同北门外的第一混成团三

营十二连连长荆天荣突然率部哗变。当时正值夜间 12 时左右，荆天荣来到北城门下叫门，意图入城袭击孔庚；无奈城门迄未打开，他怕事泄，旋即向北逃走。孔庚接到报告，急派兵追击至口外八苏木，将荆天荣当场击毙，并活捉了几名士兵，其余四散。追击部队将荆天荣的尸体拉回大同，在一空场上，将尸体立起，背后插一木牌，上写“叛官荆天荣”五个字，亮尸三天。此次大同兵变和包头兵变如出一辙，出乎孔庚意料之外。过了几天，张树帜和孔庚在一起吃饭时，张对孔说：“看看镇守使把兵带成什么样子了！”孔庚一言未发，不欢而散。

1917 年 7 月，张勋复辟，黎元洪不能行使大总统的职权，孔庚闻讯，急去北京和黎秘密联系。不想张树帜受阎锡山的密示，趁孔不在，带兵闯入镇守使署监印室，将镇守使关防抢走。当天孔庚由北京回到大同，只得忍气吞声将镇守使职务交与张树帜。孔庚临离大同时，曾给阎锡山去电说，他的部属多系南方人，回籍路费无着，而他本人尚有亏空，计需银洋二万元。阎锡山接电，最后送了个人情，电复孔庚由大同晋胜银行如数支取。孔接款后，与部属分月。从此孔庚即离开山西，寄居北京。

孔庚在山西任职时，每月薪公费用大洋 1000 元（薪饷、公费各 500 元），不动产在包头和大同口泉各有煤窑一处。家属有妻妾二人，还有侄儿、侄孙等多人；佣人有厨子、老妈、婢女……每天在公馆吃饭的有 15 人左右。孔庚本人常穿家做鞋，不吸烟，吃饭和属员同桌。但有宾客，必食以山珍海味，应酬花销很大，经常入不敷出。

孔庚住处，布置豪华，院室之内，经常摆设四季各种名花，五色金鱼……当时大同有个施家花园，善于种花养鱼，按时按节供应孔庚欣赏。

孔庚的会议室，挂有阎锡山像；办公室挂有蔡锷、黄兴、王家

驹像，还悬有刘墉墨迹中堂，董其昌墨迹对联；会客室通顶木屏墙，联节多扇，均系历代古迹黑油色画屏，五彩花卉人物，琳琅满目。寝室设有活腿带帐钢丝大铜床……一切陈设，均极讲究。

孔庚对古代铜炮很感兴趣，当时大同城墙上遗有明崇祯年间护城大炮多尊，名为“大将军”、“二将军”……孔庚修建镇署时，特令士兵从城墙上搬来铜炮八尊（炮身長六七尺，口径四寸左右），以示“威严可畏”。

孔庚好马喜鹿，当时有匹油赤膳马，日行200里；还有一匹乌黑马，名叫“黑旋风”，也是名马。他还养有一匹大鹿，在操场上乱跑，见人就追，以蹄刨人或用角撞人，人多怕它。

孔庚经常坐在办公室内，除批阅公文外，常读书、写字。对下层群众，特别是部下士兵、伙夫、马夫等，向不接近，他们的疾苦，也从不过问。他对护兵、马弁、副官等贴身人，也都放任不管。

孔庚从小念书费用多受岳父帮助，因之其妻高氏自认有功于孔，在孔纳妾之后，经常吵闹，有时竟动手动脚，把孔庚的脸面抓破，伤痕斑斑，以致多日不能出面办公。孔庚无处发泄，只得迁怒于厨师，以饭菜做得不好为词，责以军棍。孔庚家庭自从他在大同纳妾后，经常闹得一塌糊涂，这对孔庚刺激不小。

以上关于孔庚在山西的一段事迹包括孔庚本人和他家庭生活的一些片断情况，均系根据我当时给孔庚充当侍卫时的亲历亲见亲闻而写。至于孔庚离开山西以后的情况，就不详悉了。

（孟继林）

二 兵败下野，对山西军政“遥控”指挥

阎锡山是在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混战失败后被迫下台的，

他下台后就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他第一步先跑到天津日租界，第二步在日本的保护下又转往大连。

1930年阎锡山未失败前我曾充第十八军军长，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混战时，我曾参加津浦路山东方面的作战，在这次混战中我因自己环境不顺，因而思想悲观，且以受伤后久久不愈，即自动向阎辞去军长职务。

1931年山西在张学良将军统治下，我曾被任命为北平海陆空军副司令行轅中将参议，在北平就差后消闲无事，悉由天津往大连如乘轮船，只需不到一昼夜时间即可到达。因此我于1931年春季，由天津乘日本轮船专往大连探视阎锡山。

我自1916年即在阎集团任职，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总的来讲是比较接近的，此时第一是眷念旧情，未免有兔死狐悲之感，第二乃借此机会一献殷勤，以为将来前途创造条件。在他失势时期表示接近，这即是旧社会官场中所谓的“烧冷灶”，希图他再度得势后我能再向上爬。

在大连我与他同生活约半年之久，在这个时期他在政治方面一切内幕活动未能窥见，但我所见到的几则他的生活情况，照实写述，以供参考。

当时随阎流亡的人员，主要是赵戴文，其次是张恺、宋澈、靳瑞宣、李惠卿、宁超武、梁介卿。这几个人是在阎流亡之前，慎重选择的。以上除赵戴文之外，都是在日本留学多年，其中以靳瑞宣为最为得力，在当时有些与日本人交涉的事是他负责去办的。

随从的眷属是他的夫人及其长子阎志宽，尚有他的三弟妇（续氏），此外女性尚有宋澈的女人，也是个日本留学生。

在大连的住宅是在大连市郊区黑石礁，这是张宗昌在这里修建的别墅，独立楼房一幢。

日常起居生活是每日上午为讲学时间，所有人员都必须参加，赵戴文主讲，题材也是赵戴文选择的，经常是讲些孔孟的道理，有时也讲佛家的学说。总之是为了消磨岁月，驱愁解闷。其随从人员中也有个简单的组织，有各人的责任，如靳瑞宣是日本爱知医学校毕业的，他有一个日本女人，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宋澈是日本商业学校毕业的，也是精通日语；宋超武在日本是学文科的，工书法，他是负责阎锡山的日常函牍，及替阎做些写字应酬；李惠卿是负责会计，梁介卿是负责交际，张恺是一个顾问的地位，未负什么日常事务的责任。同时必须指出，这些人在后来的沦陷时期都当了汉奸，张恺曾化名张尔庸任北平师大伪校长，宋澈在太原沦陷后作了伪山西教育厅长，靳瑞宣任伪山西省卫生局长。

这些人当时每日是在混过上午这个讲学时间，下午即可以自由活动，到大连市内玩玩，而阎锡山下午也要在附近郊外散散步。

关于他对山西方面的军政联系，经常负责来往传达的人是他的亲信副官刘升（字清斋）。

关于他的一切私人经济，负责人是他的近支本族阎达仁及其表弟曲宪治，他们也是经常来往于太原大连之间。

在阎流亡大连时期特意前往看望他的，有他的秘书长贾景德、旧北平市市长张荫梧、旧北平市宪兵司令楚溪春及秦绍观。这些专往看望他的人，在到达大连登陆时，要经过大连市日本雇佣宪警（中国人）严格的盘查，要将来历弄清后才能登岸前往，不然即不能到达阎住所。

例如张荫梧去的时候化名为张子野，在他登岸前未将来意表

明，经过日本宪警详细盘查后，指出他不是张子野，而是张荫梧，并说你是过去北平市市长，还拿出他的照片，而张荫梧仍是坚不承认，结果把他押交日本的警察厅，事隔数日，经过阎派人前往交涉，才将他交给阎锡山。

我是在1931年2月间由天津乘日本轮船去大连的。当时我不了解这种情况，也是隐名托故去大连的。在轮船靠岸后，日本的水上警察登上轮船后，即由茶房告诉我说，要你在最后下船，经详细检查后，他们问我你是否来看阎锡山的，我说不是，我是专来大连购买种蜂的。结果他们告诉我，来看望阎锡山是可以的，但我们必须把你们的关系弄清楚，以免误会。同时他也指出你过去是阎锡山的什么军官，并且也拿出了我的照片。在这种情况下，我即承认是来看望阎锡山的，因此他们即替我雇了汽车，并且用电话通知了阎锡山的住所，才免招一切的麻烦。由这一切事实证明，阎锡山在大连居住也是不自由的。

在阎锡山的住所附近，经常看不到有什么警察来往，同时也没有什么日本公务人员来此调查，但是我们的日常行动及我们的内部生活，日本人是了解的。当时我们相信这几个有限的人是彼此彻底了解的，绝不会有与他们联系作些侦察行动的，但是我们这些内部细事，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方法侦知的，可能他在这所指定的住宅内部是有些间谍的秘密设备。因此也可以证明，阎锡山在这里一切言语行动都是在日本人监视之下的。

参观日本军舰长门号与唯武器观点

1931年春，日本长门号兵舰访问大连时，大连的日本当局，曾邀请阎锡山前往参观。这个兵舰是日本人自己认为这是他们在太平洋上争夺海上霸权的主要武器之一，它的一切装备都是比较新式的，与此并称的尚有陆奥兵舰。当时我们这些人因中国没有

海军而产生悲观的思想，都认为这真是一种了不起的武力，在精神上具有一种先声夺人的威势；而日本人邀请阎去参观这个兵舰的动机，无非也是为了炫耀他们的侵略力量，在精神上先给我们一种打击和威胁。

阎锡山在参观了这个兵舰之后，曾这样说过：“若以武器装备来说，我们是不能与日本人作战的。”他的这种唯武器论观点一直是保持在他对日本抗战的整个时期。

自我反省与“实物证券与按劳分配”谬论的产生

阎锡山在大连流亡时期内也曾不断假惺惺地作了一些对自己过去的反省，并且也广开言路，要求在这里的随从属员尽量提出他过去所犯的一切错误，来对他公开批评。但是他的反省与客观方面对他的批评，主要目的并不是针对他反人民的观点上，而是对他在过去一切统治方法的不严密，而导致了这一次不幸的失败，是要取得教训，在将来统治的方法上，做的再好些。我在大连居住期间，他也曾问过我“你对我有什么意见”，我在当时也是与他们一样不能例外，而向他提出一个很简短批评及改进的意见。

我说我们这次对蒋介石的作战，在形式上看，不能不算是规模很大的一次，而且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一次，但结果是失败了，其原因即是虽然凑集的兵力很大，但目的是各自为己，即所谓同床异梦，在有利方面是争先恐后，无利则尽力后退，最明显的如刘茂恩的叛变和石友三的自动撤退。

我的看法是兵力再大，如无一种政治理论中心来作基础是终于不能成功的，蒋介石尚有个三民主义来吸引一切人，而我们有什么东西来作为一种共同奋斗的目标呢？

他当时告我说“我现正写一种东西”，他所写的这种东西，

即是指他在抗战前所发表的那个“实物证券与按劳分配”。这种主张是在他未下台之前即已着手编造的，是由山西国民党李江（字冠洋）来主办的。这本书对马列主义来说，他既不是修正主义，也不是改良主义，而是一种剽窃行为，即是把马列主义中一些名词误解误用，勉强镶嵌在自己的头上来欺骗一些落后的人们，他竟欲拿上这种东西来进一步剥削山西人民。其实质是要把人民手中的一切实物，变成一文不值的证券。旋因七七事变抗战军兴，未能在山西试行。

对山西军事中心人员的联系与考验

阎锡山在这一次失败以后，很用心地对山西现任高级军官，考验他们思想上对他的向背，这是他日常最注意的一件事。山西在阎锡山统治时期，军事高级人员是以杨爱源、赵承绶、王靖国等为基础，因为这些人都是他五台县人。在大连时期，有一次他谈到赵承绶，赵戴文即从旁喝彩说，你看印甫（赵承绶的字）毕竟是咱的人。但赵承绶根本上是一个粗鄙无谋，争逐酒色的军人，为什么阎锡山特别重视他呢？完全是宗派作法。当时山西曾流传着一句话，即“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挂”。

在大连时期，有一次孙楚给他来了一封信，说：“只要有我在山西，他们（山西省党部的反阎派）对总司令的家属及财产，是一草一木不能让他们侵犯的。”这时候赵戴文也从旁赞美说粹岩（孙楚的字）毕竟也是咱们的人。这个赞美的口吻，在“也是”两个字上，即与他喝彩赵承绶，严格地区分了远近的界限。

由大连返回山西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1931年6月，阎锡山派我回太原送达他给贾景德、杨爱源、徐永昌等的秘密信。

当我到大连居住月余后，向阎锡山告辞，要回太原去，他不让我回去，他说这里没有一个军人，你不要回去，就在这里吧。并把我作为他的随从人员一样待遇，每月给零用钱百余元，在大连是使用日币，并配以日本人所谓金票若干。有一天忽然让我马上准备回太原去，有他自己亲手译成的密电两件，一是给他长住天津的前任秘书长贾景德，一是给杨爱源与徐永昌。究竟内容说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为了避免关卡检查，让我穿着极平常的服装，而船票也买的是普通客舱，并把这两件密电装在携带的热水瓶壳内，因此到天津下船后，通过天津海关的检查，只是盘问了我的来踪与去向，并未对我作详细的检查，是把我看成一个普通商人即放行了。因此我很平安地到达了天津，马上回复了他一个电报，告他我已平安到达天津矣。

这个时期，正是石友三准备向张学良进攻，原来计划山西方面也要参加，但后来山西方面又突然改变态度，决定不参加这一冲突，可能在这个时候，阎又与张学良拉上关系。而山西对石友三倡导的这次冲突忽然改变了态度，可能与这两件密电是有关系的。这件事可以证明，他虽然居住在大连，而山西的军政决策仍然是控制在他手里。

蒋介石是在1931年12月，因宁粤之间的矛盾发生了战事，而被迫下了台。但蒋介石下台不久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帮助下又上了台，同时他又联系了汪精卫集团。这个时期，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以过去的关系，看阎汪之间，在个人情感上尚是很接近的，阎锡山由大连返回山西，是否他们在事前已有联系，不得而知，但他上台之后对阎锡山又不能置之不理，当时是由汪精卫提议给阎锡山以山西绥靖主任职权，并商之蒋介石，而蒋介石尚恐他以职位太低而不就，汪精卫则主张试试看，因此即发表了这个命令。当把这个命令送达太原之后，徐永昌、杨爱源等也以这个

名义与阎的身份不符而不敢立即把这个命令送交阎家中（阎山大连回来后，即住在五台县河边村），经他们再三斟酌后派了一个阎的亲信，把这个命令送到阎的家中，但是很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他毫不犹豫地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命令，并告来人说：“你回去告他们说，我明日即到太原去。”

（秦绍观）

三 亦友亦敌：阎锡山和徐永昌的彼此利用与相互排挤

作者跟随阎锡山多年，曾任阎的参谋长。本文详细介绍了徐永昌从反阎到投阎的经过；到山西后被阎倚重，帮助阎东山再起；后来与阎发生矛盾，又离阎投蒋；以及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与阎相互利用等情况。

徐永昌原系国民军三军孙岳的部将，孙得病由徐代理军长职务。他由反阎而投阎，得到阎的倚重，在阎方担任了许多要职。阎从大连回来，他为阎奔走，帮助阎重登政治舞台。后来，徐在山西省主席任内，阎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时，二人发生矛盾，徐又离阎投蒋。勾心斗角、互相利用，贯穿于他们关系的始终。其经过情形是很复杂的。笔者在山西工作时，知道一些情况，兹将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撰写出来，以俾参考。

徐的出身简介

徐永昌字次宸，山西崞县人，1900年父母去世时，他12岁，流浪在大同，无人抚养。光绪、慈禧逃难赴西安时，有护驾部队毅军某部徐书记官，怜其年幼无依，予补以马夫名义，留在身边当勤务兵，徐观其聪敏，教他识字读书，成年后考入毅军随营学堂。1912年考入北京陆军大学，三年毕业出任保定孙岳旅部参

谋，嗣升该旅的参谋长，后改任团长。1924年冯玉祥组织国民军，孙岳为国民三军军长，徐永昌从那时起，任国民三军的旅长、师长以至代理军长。徐多心计，寡言笑，说话简要，善窥人意。山西人都称许他为有头脑的军人。

由反阎而投阎

徐永昌与小同乡续桐溪相友善。续在辛亥革命以后，受到阎锡山排挤，多年在外专做反阎工作，徐也是反阎的人，因此为阎所注意，认为徐是他的政敌之一。二次直奉战争后，1925年，山西的东南北三面被国民军包围。时续桐溪任国民军总参议，与岳维峻、孙岳等制订各军分路打山西的计划。但孙岳部时驻保定、大名，该地区为其饷源所系，孙岳坚主打天津的奉系军阀李景林，认为得海口胜于入据山西。徐永昌服从了孙岳，不从续桐溪的计划，反而把唯续命是从的反阎分子弓富魁、胡德甫等部也拉去打李景林，仅二军的樊钟秀一部攻打山西，结果被阎锡山击败，续因此气愤而死。

打李景林时，孙岳正患病，徐永昌代理军长，一日去北京见执政段祺瑞。段曾告徐说：“冯玉祥难共事，你是山西人，不知接近阎锡山。阎为人稳健，在国内有声誉，大有前途。”因阎是依靠段的，阎曾拜段门称弟子。徐对段言很感动，这是徐倾向阎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后徐在打李景林时，派其亲信副官苟义送了一封信到太原，交山西炮兵司令周玳，信内是这样说的：

子梁^① 仁兄大鉴：京师一别（周随阎锡山到北京晋见黎元洪时曾与徐见过面）已十有二年矣。弟离故乡，长期混迹军旅，几欲归里，以晤故友，奈军务缠身，事与愿违。今有告者，西峰

① 子梁，周玳字。

(续桐溪字)、钟秀(樊钟秀)欲图山西，今将郑州会议纪要令苟义奉上，盼能转告阎公，并致弟久慕之情。弟虽不才，岂能自侵乡土，请在适当时机遣苟义返回。兄倘有教我，实为弟之幸，时机迫切，后会有期。弟徐永昌上。

这是徐永昌出卖朋友倾向于阎的第一步。

周玳将徐信和郑州会议纪要呈阎看了。阎得悉徐不听续桐溪言，使樊钟秀的入侵未能成事，同时续桐溪因此而气死，从此对徐有了好感，并且很注意徐信后面的“后会有期”一句话，认为徐有来归之意，便叫周玳复信拉徐一把。周即本着阎的意旨复了一信，大意是：尊副官苟义来晋，函件俱已收到，以之转达前途，前途对吾兄甚为钦佩，盼以后时通款曲云云。

1926年冯玉祥联合国民各军打奉军，奉军张作霖与直军吴佩孚化敌为友，联合起来以对国民军。阎锡山这时志在解除国民军的包围，就站在张、吴的一边，因此国民军除以主力在南口与奉、直军作战外，抽了一部兵力从雁北打山西，遂演成国、晋两军雁北之战。时孙岳因病不在军中，国民三军在冯玉祥指挥之下，担任蔚县方面的任务，徐与晋军采取对峙的态势，并未向山西进攻。这是徐倾向于阎的进一步表现。

在南口、晋北战争中，国民军战败，冯玉祥部的韩复榘、石友三部降阎；徐永昌率国民二军退包头；其余退五原、临河。他们共同感到最大的困难是军食无着。是年秋，冯玉祥由苏联回国，与广东国民政府取得联系，在五原誓师，重整旧部。徐因各种原因感到难与冯共事，又不赞成冯走亲共路线，不愿随冯西行，把所部南移驻扎准格尔旗，声言愿在该地屯垦。是年冬，徐派李居义(山西安邑人，任徐的交际处长)到太原向阎通款曲。阎表示愿徐来归，并令周玳写了一封信给徐，信上遵阎的意旨说：“次宸吾兄赐鉴：前由尊副官苟义奉上一函，谅已早迹。百

帅对吾兄处境极为关心，晋各界人士亦久慕吾兄之名，渴欲一晤，盼能抽暇来晋一叙，旅次一切，弟当代为筹划，嫂夫人如愿回来，更为欢迎，望勿作过多之考虑，如吾兄之明达，定察弟之意也。弟周玳上。”（周的信是书后才透露的）适冯玉祥派徐为代表赴晋晤阎，表示愿恢复旧好，要求归还韩复榘、石友三两师。徐接到周玳的信，即到太原见阎，阎亦愿与冯弃仇和好，除使韩、石两师归队外，对徐优礼相待，并送徐4万元。徐乃一变而为阎、冯双方倚重之人。徐遂决心率部投阎。

1927年1月，徐又到太原晤阎，阎欢迎其率部队驻扎山西境内。徐提两个条件：第一不改变国民三军番号；第二如打奉军，愿受命。阎均答应了，并给了军队维持费20万元。阎在设宴欢迎徐时，阎、徐作了一次有趣的谈话，笔者在座，兹将其谈话记在下面：

徐说：“我虽然是山西人，一向在外面，对山西的事情知道很少。常听人谈，总司令（指阎）所施行的是适时政治，不知内容如何，愿闻其详。”阎一向说话都不是开门见山的，便笑着说：“适时政治，也没有什么高深的秘密，打个比方吧，好比人穿衣服，春天的大褂和秋天的大褂都是适时衣服，但是有区别。春天的大褂要比秋天的大褂好，因为前者愈走愈适时，而后者愈走愈不适时了。”这个比方隐喻着春天大褂是广东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秋天大褂是北京当时的北洋政府，就是说，时局向前发展，国民政府必胜利，北洋政府必失败。徐永昌听了之后，对阎的第三种态度不满意，接着说：“我明白了总司令的意思，我也有个比方，好比开商店，如果夏天卖皮袄，冬天卖扇子，这个商店恐怕很少有人上门吧！”徐讽刺阎当时所搞的一套封建落后的什么用民政治、村本政治，是不合潮流的。阎知徐在讽刺自己，又接着说：“古时淮南子说了一个‘鲁阳挥戈返日’的故事，挥戈一指，日

返三舍，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咱以为返口并不难，你只要等12个钟头后，日必返东。”他的意思是说，等到时机到来，一定参加革命。在座的相顾而笑……

徐永昌见阎后，阎叫他把部队开到晋南临汾县，徐所部步兵两师、骑兵一旅、炮兵一团。遂沿黄河西岸南下，从碛口渡河开驻临汾。五台系有人不满阎花大笔的款收编杂牌，而且是曾为敌人的部队。阎解释说，花二三十万块钱马上增加三师兵力，还是很划算的。

是年6月6日，阎锡山接受武汉国民政府的命令易帜参战，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准备对奉军作战。徐永昌喜阎不爽打奉之约，乃遵阎命率部开到河北井陉县待命。这时徐部官兵仅发维持费，让其包办军饷，徐自称是新来媳妇，奉命唯谨。

阎锡山易帜参加国民革命后，把部队作第三次扩编时，徐接孙岳病故于南京电，即找阎请改编所部为晋军，阎问其为何如此之急？徐说，以前保留旧番号，因自己为孙禹行（孙岳字）看家，无权处理其部队，今禹行已死，不速请改编，自己无以自处，军心亦难安定。阎嘉其不忘故主之忧，乃改其部队为北方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委徐为军长，黄胪初为第三师师长，马延守为第九师师长，骑兵旅拨归骑兵司令指挥，炮兵团拨归炮兵司令指挥，所有的官长均按徐所开的名单加委。从此国民三军归入了晋军的建制，按照晋军饷章发饷，徐即成为阎的直属部下了。

受阎倚重任要职

1927年晋军与奉军开战，徐永昌任京汉路方面南路军总指挥，打了一月多，晋军败退，回守山西山岳地带。徐担任北区平型关一带守备任务。1928年，蒋介石复职后，任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所部与第一、二、四集团军一道继续向奉军作战，

徐永昌仍担任京汉线指挥任务。奉军败，阎锡山拥有晋、冀、察、绥和平、津两市地盘，徐负责接收北平市（这时南京政府改北京为北平）。1928年冬，徐被任为山西省主席。河北省主席是商震，因商与蒋介石和张学良两方均有勾搭，以拟扩充一个教导师，这是阎的大忌。他把商的兼军长拿掉，放冯鹏翥接任了军长，并调商回山西任主席，次年8月调徐到河北任主席。

阎、冯酝酿反蒋时期，阎调徐永昌和杨爱源（时任察哈尔主席）回太原议事，徐不赞成与蒋介石打仗。阎说：“蒋欺负咱们没办法呀！”徐说：“可以想不打仗的办法解决。”阎说：“办法倒是有，咱走开，你们向蒋投降，那就可以不打仗。”徐说：“总司令如果这样说，我的话取消，我们就打吧！”

反蒋阵营酝酿成熟，徐永昌被任为河南第一路总指挥。徐认清了阎的“二”的做法和曲线统御，且有鉴于商震的覆辙，即要求任杨爱源为副总指挥，这等于请求阎派监军。打了7个月的仗，反蒋战线失败，徐指挥部队退却，让部队先行，走上党入山西，自己殿后，部队保全甚多。阎下野逃大连，将晋绥军交徐和杨爱源二人统率维系，俾作卷土重来资本，商震仍保持住无权的山西主席地位。

阎到大连，蒋把晋军交张学良改编，只准保留四个军。徐永昌任第三十三军军长，商震任第三十二军军长，杨爱源任第三十四军军长，傅作义任第三十五军军长。阎的基本部队五台系大大缩小。五台系认为这是商震的建议，于是发动驱商运动。蒋介石即把商调出山西，任命徐为山西主席，这样，徐又成为蒋、阎之间的重要人物。

为阎运动再起

1931年8月，阎锡山由大连乘日本民航机返回山西河边村，

徐永昌便到河边村去见阎，对阎说：“我奉中央命令，应有责任，总司令突然回来，让我怎样处理呢？”阎很不快意地说：“你看该怎样办，就怎样办吧！”徐说：“说因为老太爷有病，回来侍奉汤药，不提政治问题好了。”阎说：“好吧！你就这样说吧。”徐听了这种口气，感到婆婆回来了，只好仍作媳妇，把想为山西做点事的志向抛到冰窖里了。

蒋介石闻阎回来，大怒，立即叫何应钦、孔祥熙转告阎即刻离晋；同时河南主席刘峙、山东主席韩复榘也通电反对阎锡山回晋捣乱；北平张学良并派兵到五台龙泉关进行威胁。这时形势对阎是很不利的，但阎却满不在乎，处之泰然，因为知道日寇将对东北动手，蒋介石、张学良将自顾不暇。阎初回大同，住在骑兵司令赵承绶的司令部，赵曾问阎：“总司令阴的回来，张学良知道怎么办？”阎说：“他将自顾不暇，还能管咱们的事！”

蒋介石同时电令徐永昌限期令阎锡山离晋，徐这时的处境确实为难，一方面他是阎的看家人，一方面他是蒋的所谓“命官”，实际上徐也无力量驱逐阎锡山，只好用拖的一法。一个月以后九一八事变发生了，阎更无离晋之意，而且对山西的军政暗中一手操纵，省府的重要事，徐也派秘书长王尊光到河边村请示。这时徐永昌便采取了坚决袒护阎的立场，并且认为阎无名义，终非久计，转而决心为阎谋再起，以解决自己处境的困难。

适逢蒋介石派魏道明到北平，约徐永昌协商驱阎的办法。徐到北平后，即站在袒护阎的立场对魏说：“阎不离晋，我实在无法驱逐他。退一步说，即使他仍去大连，谁能担保他不再回来呢？现在日本侵华日急，我们应该团结国内的力量共同御侮，岂可再算旧账‘为渊驱鱼’！”魏对徐言，表示首肯。徐又找李石曾，求得对阎的谅解，要求李在蒋的面前关说。李答应了，李并约张继同做说项人。徐又请魏道明、郑毓秀夫妇找正住协和医院

养病的宋美龄向蒋关说，不要再向阎锡山逼迫，应该团结起来抗日。这一着颇有效力，蒋即不再逼阎离晋了。

阎这时在河边村见徐去北平日久不回，心中有些狐疑，恐有他变，便派省府秘书长王尊光持亲笔信去北平找徐，促徐回省。徐将运动的经过告王，令王先回复命，候其得到宋美龄回话再返省。不久徐回来，亲到河边村向阎报告，一切已成熟，只剩释放省党部委员一事耳。

原米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极端愤慨，学生尤为激昂，太原各校学生屡推代表向省府请愿，要求抗日。徐永昌认为学生轻举妄动，不予理睬。是年12月18日，太原大中学生集合数千人示威游行，向省府请愿。时正值省府例会，学生便全体冲入省府，吓得徐永昌和委员、厅长均从后门逃走。学生气愤，把省府的门窗用具捣毁，然后结队到国民党省党部请愿。党部紧闭大门，学生硬冲，党部开枪，打死中学生穆光政，各校罢课游行，要求惩办省党部的凶手。阎锡山在河边村闻讯，使用电话叫太原警备司令荣鸿胪把10几个省党部委员扣押在警备司令部，久不释放。阎的这一处置是两面的，一方面扣省党部委员以平学生的愤怒而防运动扩大，影响他的登台；另一方面为了他在下野期间省党部大肆反他，以图报复。但对省党部却说，这是为了保护省党部大员的安全。这时蒋介石提出，必须先释放省党部大员，才能谈得上给阎以名义。

1932年，日寇在上海又发动了“一·二八”事件，直接威胁到南京政府，在国民政府共赴国难口号下，汪精卫又与蒋介石合作，并当了行政院长。这就给阎锡山图谋再起造成一个机会。阎即派赵丕廉找汪，请汪帮忙，支持他重握山西政权。

阎对释放省党部委员事犹豫不决。事隔月余，徐永昌恐日久生变，便于2月某日派王尊光到河边村见阎，说 he 已决定释放省

党部委员，如何不使学生滋闹，请阎安排。阎听了王的报告，大为着急，放了恐怕学生再闹，不放又恐阻碍他的再起。他打电话问太原荣鸿胪的情况，荣说10几个党部委员已照徐主席指示于清晨乘火车出省了。阎对王尊光说：“次宸胆太大，咱不敢做的事，他竟办了。”阎一面电太原暂时不要宣布释放省委消息，一面亲笔写信令做组织工作的李冠洋、邱仰浚等叫他们安定学生勿使骚动。在这种情况下，任阎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的命令就颁布了，徐永昌为阎图谋再起的计划实现了。

1932年2月29日，阎锡山由河边村到太原，后在何应钦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监督下宣誓就职。阎在就职的答词中，只字不提抗日御侮，而只说什么“安定地方，扫除一切障碍”等语，从此，阎锡山又与蒋介石、汪精卫搞到一起了。

阎、徐的勾心斗角

阎锡山重登政治舞台后，便与赵戴文谈论以后的做法。阎说：“次陇（赵的字）咱们总算回来了，在军事上咱不愿与外界再争，只要咱们把晋绥两省（绥远是他的绥靖区）经营好，他们也莫奈何咱们。”这几句话是由阎的老副官刘升在旁听见传出的。于是他一方面缩编军队，一方面举办所谓“山西十年生产建设计划”。徐永昌对这一措施，极表赞成，但是后来看到阎的种种趋向是以生产建设其名，搞官僚垄断资本其实。这些措置处处与省政府的职权息息相关，阎又大小事一把抓，有些事情，阎直接指挥个别的人办了，省主席还不知道；有时事情已经施行了，还要敷衍徐说：“次宸，你看这事怎么办？”假意对徐尊重。徐曾向秘书长王尊光说：“总司令（这是徐对阎的惯称）办了好多事，我却是八个字主席，‘倡用国货，整顿教育’。”徐对其余大小事，都叫秘书长向阎请示；日常事则交秘书长主持，

把自己的私章也交秘书长代行。徐一次到周玳的家中发牢骚说：“总司令有什么事下个条子交我办好了，偏又问这怎样办，那怎样办，使我摸不着头脑，无从置答。”这是徐、阎权力之间的主要矛盾。

当时国人倡用国货，山西倡用土货，徐永昌主张国货土货并重，这与阎锡山的独立王国经济是不相合的。

当时的学生中，搞爱国运动的进步分子固多，但钻入阎锡山的反动组织领取津贴的浪荡分子也不少。徐永昌厌恶这种荒废学生学业的做法，认为学生不应参与政治活动。1935年，教育部令举办学生暑期会考，学生罢课游行表示反对。徐叫宪兵逮捕首要学生10余人，送回原县羁押，下令不准任何人探视，非到确实改悔时不准释放。这与阎锡山收买落后学生以防进步学生的办法也是有矛盾的。

徐这时仍兼第三十三军军长，统率着他的旧部，但阎对他的部队，随时调拨别人指挥使用。例如1935年派孙楚为陕北“剿共”总指挥，指挥孟宪吉、陶振武、马延守、方克猷、陈长捷五个旅，马、方即是徐的基本部队，这也是徐不痛快的。

阎、徐在这种种矛盾中，当然隔阂日深。

离阎投蒋居要津

147

徐、阎本质一样，但是作风不同。徐抓大事，不问细事，用人不疑，说到做到；阎则大小事一把抓，一抓到底，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用人疑人，束缚所属不敢前进。徐嫌阎琐碎，阎嫌徐不积极，日久情感渐疏，隔阂日大。1935年冬，阎赴南京开绥靖会议回来，在一个总理纪念周上讲话，大骂公务员不做甚务甚，并说很想关闭城门，把这一城人全烧死。散会后，徐永昌以为阎这脾气是对他发泄的，便向秘书长王尊光说：“总

司令今天这样发脾气，是不是嫌我不尽责，要杀我。”王答：“他骂人是常事，怎能牵涉到你的头上。”徐默然不语。

1936年春，防堵红军东渡抗日，召开高级将领会议，阎大讲红军厉害。徐对阎这类话早就听得不耐烦了，当场即顶碰说：“照此说来，这个仗不能打了，我们只好投降红军了。”阎大为不悦，会议不欢而散。为此事，阎、徐均闹了一场病，虽经王尊光从中疏解，但徐、阎隔阂加深了。徐即暗中向蒋方活动。

徐一日到周玘家，向周打哑谜说：“子梁你的表儿点钟了？”周不知所谓，即答：“整12点。”徐说：“你说总司令的表是几点？”这才使周明白过来，便说：“总司令的表恐怕是1点。”过了一会儿，徐又问：“子梁，你穿的是什么衣服？”周答：“我穿的是单衬衫。”徐说：“总司令他已穿上夹袍了。”周这才明白，徐在山西呆不久了。这段对答是周在徐离开山西后透露的。

徐既在蒋方活动，蒋喜其报己，正可以借此挖阎的墙脚。在1936年5月，三方电徐到南京任职。前两份电报，阎扣留未交，第三次来电，阎认为蒋、徐关系成熟，久留无益，而且赵戴文这时尚无适当位置安插，乃把蒋电交徐，将计就计，嘱徐在蒋左右为已尽力。徐遂于是年6月某日向阎辞行到南京投蒋去了。山西省政府主席由此时起即由赵戴文继任，山西的军政又统一于阎一人之手。

徐走后，徐的部下军队在抗日五次扩充时，不独带兵官未获提升，并把徐的两个师长方克猷、马延守下放，部队被分别改编于五台系的部队中了。

徐、阎互相利用

徐永昌到南京后，初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抗战时任军

令部部长。他借在蒋方的地位仍为阎出力，与阎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因此，既得到蒋对他的相对信任，阎又利用他在蒋的左右便于说话，为阎谋了利益。抗战初期，阎的旧军多溃散，新军随进步人士离阎抗日，阎要重振军队，经徐向蒋关说，蒋给了阎8个军15个师的番号，饷项服装照发，因此，阎又搞起了4个集团军，增加了阎的反动力量。嗣后在抗战末期和解放战争中，徐曾奉蒋令三次到山西商议军事。

1942年，阎锡山有单独向日寇投降的行动，即有名的“阎日安平会议”。蒋介石即派徐永昌和铨叙部长贾景德（原阎的秘书长）二人到山西克难坡阎处商谈，对阎说明太平洋战事爆发，英美的失败是暂时的现象，最后日寇可能失败，对日求和，可以从缓，且不要单独进行。阎对从缓表示同意，对不要单独行动，内心并不同意，并强调环境困难。徐、贾又为之说项，清理了兵饷的积欠，增加了经费，准备在陕西购买军粮。

1946年4月，国、共、美三人军调小组到山西视察，徐永昌被蒋介石派充国方代表，随同共方代表周恩来和美方代表马歇尔到达太原，徐为阎帮忙，掩护了阎的许多罪恶。

1948年7月，解放战争时期，阎的王牌野战军赵承绶部被解放军全部歼灭，赵被活捉，晋中各县都已解放，阎锡山据太原孤城顽抗，徐永昌又奉蒋令飞太原视察阎锡山如何应付，阎要求增援坚守，经徐的周旋，从榆林空运第八十三旅，从西安空运第三十军的一个师助阎守城，使太原延迟了9个月才解放，太原人民多受了9个月苦难。

徐永昌后来当了国防部长，阎锡山逃到广东当大老任行政院长时，徐把国防部长交给阎兼任。大陆解放，阎、徐各自逃往台湾去了。

（辜达岸）

四 枪杀李生达：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蒋介石自“四·一二”叛变革命后，定都南京，独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进一步消灭异己，集权“中央”。他利用金钱和官职收买对方的部下，以拆其主子的台；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冯玉祥等都被打垮了，最后就是阎锡山。而阎锡山历北洋政府 10 多年的军阀混战，一直是个顽强的“不倒翁”。1930 年，阎锡山更联合冯玉祥等大小军阀及汪精卫的改组派和邹鲁、谢持的西山会议派，发动了中原大战和扩大会议，几乎震撼了蒋家王朝。虽然最后阎锡山以失败逃亡告终，但他的军事力量并未摧毁。九一八事变前夕，他又潜返山西，接着东山再起，依然是娘子关内的土皇帝。这是蒋介石最感头痛的一块石头。

蒋介石即想铲除阎锡山的老根，因而对阎部将领的分化收买也迄未放松。同时也分析了阎的将领，有其最心腹的晋北派（以杨爱源为首），也有被笼络的非晋北派。晋北派都是些凭借封建关系升官发财的驽骀下乘，且勿说不易分化收买，纵然分化收买了，也不起什么作用；而非晋北派的将领都是以战功获得擢升的，一被分化收买，便可起栋折梁崩的作用。这些将领就是商震、孙楚、傅作义、杨效欧、李生达等。因而他们就成了蒋介石下工夫的对象。商震于 1927 年已做了河北省政府主席，傅作义于 1929 年做了绥远省政府主席，接着便是对李生达的分化。

李生达怎样被蒋介石选中

李生达字舒民，约生于 1897 年前后，山西晋城县人，民国十年（1921 年）由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初在山西学兵团当见习排长，随阎锡山参加军阀混战，以后其军职才逐步上升。到

1926年奉军侵入山西时，他当时以团长驻守大同，坚强拒守，适时出击，使奉军卒不能长驱南进。不仅保证太原不受威胁，而且粉碎了张作霖攫取山西、统一华北以抵抗革命军北伐的计划。因此，半年之间，李生达由团长而旅长而师长，连升三级，煊赫一时。奉军撤退后，阎锡山在庆功宴上特擢李于上座，得此殊遇，顿使头角峥嵘，声名大噪，这自然也会引起蒋介石的注意。其后，阎、冯同蒋中原大战时，李生达以十九军军长率部在津浦线上亦有卓著战绩。当蒋介石策划收买阎锡山部下考虑到李生达时，国民党中央委员苗培成与李为晋城县的小同乡，又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当然在蒋面前要为拉拢李生达拍一拍胸膛。所以中原混战阎锡山逃亡大连后，蒋介石曾派苗培成到天津，通过山西名流刘厚同的关系，鼓动傅作义回晋收编部队，主持善后，并指出由李生达帮同进行。虽然当时傅作义考虑到实力悬殊，未能轻诺，但从这一点上，显然李生达已因苗培成的中介和蒋介石挂了钩，必要时可为蒋所利用。

1934年夏，李生达被调到庐山参加军官训练团。蒋介石在传见时特别询问他部队的素质和装备，表示他深知山西方面待遇较低，军官一定困难很多，所以在临走时，送给李生达10万元，以照顾他的生活。至于在个别谈话时，还有什么秘密指示，那就非局外人所能测知了。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山西将领任代表出席大会的有王靖国、李生达等，而新当选为中央委员的只有李生达一人，王靖国没有当选，这就增加了阎锡山对李生达的嫉妒。

阎锡山平日最不满意的是他的部下不经过他的推荐而直接同中央发生关系，同时在这个问题上他最容易听信别人的小报告，而王靖国又是一个不会打仗专会打小报告的人。所以李生达在庐

山训练时受蒋之垂青，在五中全会时当选中央委员，正给了王靖国打小报告的好材料。可惜蒋介石在收买李生达的各种措施上，没有考虑到李头上的主子和他所处的环境。

李生达弄巧成拙

1934年夏、秋之间，蒋介石借口参加对江西中央苏区的“围剿”，指名调李生达率部开赴江西。阎锡山虽然心里很不高兴，但碍于蒋介石的命令，也不便公然拒绝。李部到江西后，并未即时排入战斗序列，只在后方做预备队。大概在蒋介石之意，先把李生达调离阎锡山的控制，对他的部队作一次整编补充，再记上一笔参加“围剿”的“勋绩”，然后再逐步提拔，以期达到反阎、代阎之目的。但李生达久在阎锡山的熏陶之下，熟悉了阎锡山那一套在军阀混战中的作法——多方面应付，最后趁风转舵，使自己处于不败之地。他自觉在山西当时的将领中算是后起之辈，居然得到蒋委员长的特别赏识，自然是荣宠意满，铭感无既。但阎锡山毕竟是自己的老长官，又处在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地位，必要时还得借重他的力量，不能遽然脱离关系。基于这种脚踏两只船的心理，所以他到江西不久，便给阎锡山打了个电报，大意是：“生达自从军以来，深蒙钧座栽培嘘植，清风雨露，恩沛滋深。寸草春晖，难报崇德。此次虽受委座之命，调赴江西，然而远离幃幃，殊违本愿，北望云山，依恋情切；如机缘有便，仍请归隶麾下，以效驱驰……”意在表示自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舍不得离开这位老长官。这在旧官场中不过是一种应酬书函，浮水秋波而已，照例是嘴里不说心里话，谁也不把它认真处理。但阎锡山抓住这个把柄不肯放松，他把李生达的电报不加可否地原盘转给了蒋介石。蒋介石一看，也揣知这是阎锡山有意捉弄人。既然如此，他只好给阎复电：李生达既不愿在江西，

乃令他开回山西。因此李部到江西后约有半年光景，仍旧开返山西。这完全出乎李生达的意料之外。据闻李生达率部到江西后，蒋介石接见他时，曾暗示到适当时机给他江西省政府主席的位置。不料自己弄巧成拙，两只船都未踏稳，不仅把一个未来的主席要脱了，而且在蒋、阎双方都划下一道痕迹，心里很觉不安。

阎锡山立下毒手

李生达的部队从江西开回山西以后，即驻扎在阳泉附近。1936年3月初陕北红军渡河东进，计划到察绥前线抗日，阎锡山闻讯，严斥回到太原料理家务的河防部队师长杨耀芳贻误军机，吓得杨耀芳当面叩头求饶，答应星夜赶赴河防。接着，阎锡山又命令李生达部也即时开赴离石增援。部队已先行出发，李生达在后边同阎锡山和绥署参谋处详细研究了前方情况及战略计划，又安顿了家务，才随后赶去。当时他的司令部驻在离石县的柳林镇。大约是他到驻地后的第二天，太原即传出了李生达被刺身亡的消息。据当时报纸记载是：李生达的卫士某人同他的姨太太王某通奸，被李发觉，卫士害怕对己不利，遂先发制人，乘李入睡后，将李打死。其他卫士听到枪声前来查见时，凶手已逃逸无踪。这是来自绥靖公署参谋处的消息。并说阎锡山接到部队的电报后大为震惊，一方面表示痛悼惋惜，一方面严令缉拿凶犯归案究办。

其实，阎锡山为人多疑善变，凡是他的干部，如果不是经过他的保荐而直接与中央拉关系，他都认为是背叛，必除之而后已。对文职人员发现上述情事时，不过罢职丢官，永远不肯再用。如军事将领中发现此种情况，便认为会威胁到他的生命和地位的安全，那就不能轻易放过了。李生达遭嫉妒的原因：第一，他与一向反对阎锡山的山西省党部首领苗培成关系密切，又由苗

替他拉上了中央的关系；第二，蒋介石对他的收买利用，阎已有所察觉；第三，王靖国、李服膺等晋北派军人的谗谮。所以当他从江西开回山西后，已感到阎对他不似当年守卫大同连升三级时的那种味道了。至于被害的内幕，系阎锡山授意其亲信军人李服膺，李就李生达卫士中与其有地域关系之某人予以收买而行刺的。事后便制造出卫士与其姨太太通奸的一条消息来。其实，李的姨太太为人正直，夫妻感情十分和好，根本没有什么不规矩的行为。不过，真事假不得，假事真不得。阎锡山杀害李生达的事，虽然当时报纸上有被卫士因奸刺杀的新闻，阎锡山也有缉拿凶犯的命令，但事实真相不久便传开了。

巧遇合灵堂失火

李生达的灵柩从离石运回太原后，在太原市大北门街东二道巷他的公馆开吊奠祭，一时车水马龙，宾朋如云。花圈、挽幛、挽联等挂满了房院内外和街道。就在开吊的当天，因烧纸时注意不够，一团火花飞上了花圈，立时引起灵堂内的火势蔓延。家人和宾客们见势不好，首先要保护灵柩的安全。此时灵堂内的火舌已伸出门外，引着了灵堂外的花圈、挽联。在此紧要关头，一些人奔走内外扑灭火焰，一些人打开后窗忙着把灵柩往外抬运。李生达的姨太太王夫人自然特别关心灵柩，她一直在灵堂内张罗照顾，指挥呼喊。大家见灵堂火势已大，喊她赶快出去，这才提醒了她，抱着吃奶的孩子夺门而出，不料灵堂门楣上边一个着了火的花圈，烧断绳子跌下来，正套在她的身上。她一时“人忙无智”，又要顾孩子，又要下火圈，虽然她也争呼救援，但当时人声嘈杂，谁也没有听见，及至旁人发觉时，火势已延烧及全身衣服，迨扑灭了火焰，人命已挽救不及了。至此，爱妻娇儿随着李生达同穴永息了。当时人都叹惜说：“这真是祸不单行啊！”迷信

者更有许多附会之说。

此事过去以后，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是阎锡山授意于人，趁奠祭之际，故意纵火焚烧；有的说老阎嫉妒、仇恨的是活人，人已被杀害，又何必再纵火焚尸呢？有的说事出巧合；有的说“天意难测”。总之，众口纷纭，莫衷一是，惟凭冷眼人善自推断去吧！不过就此一事，可见阎锡山多疑善妒、阴险毒辣之一斑。其后暗杀杨效欧，陷害陈长捷，均出于此种心计。

（刘冠儒 关民权）

五 “兵农合一”制度：阎锡山的治民电鞭

“人民是虎，组织起来是个乱子，不组织是个空子，宁叫造成乱子，不叫漏下空子”，这是阎锡山的“治民哲学”。到了1943年，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阎锡山又发展了他的治民哲学的内容：“人民是虎，组织起来是个乱子，要制服这个虎，堵防这个乱子，必须使用‘电鞭’，‘兵农合一’就是独一无二的‘电鞭’。”这就一语道破了“兵农合一”的实质——农权制度。

“兵农合一”的组织形式是：18—45岁的人，三人编成一个组，一个叫“常备兵”，入营服兵役，两个叫“国民兵”，在乡种份地，其他老幼妇孺分编在各个小组为辅助劳力。国民兵要担负常备兵的优待粮三石（不确），入伍前交付一半所谓“安家粮”，役满后交付一半所谓“就业粮”。常备兵服役期限为三年，期满后用抽签法由本组一个国民兵轮换。一切小手工业者和行商摊贩，编为生产兵，有的人在乡或外出，每人年交粮食五石（不确），有的拨归部队服劳役，自己吃自己，不出食粮只服劳役。国民兵耕种的份地，依据自然村界限来划分，通过大量划分的手续，在地插牌子，固定地段，在家造册子，建立档卷，按组过割

授地之后，便算完成。它的整套手续，就是“编组小组”，“划分份地”，这边编组，那边划地。

田赋征购，以粮银的“两”为计算单位。征购以数字规定，一般的是“征一、购二、附加五、马料四”。这就是说，不算随时的“派购粮”和以后实行的“赊购粮”，每粮银一两，一般的要交纳粮食一石二斗。其他差款、各级行政费用和一切杂项费用的交纳，是另外一件事。有一首民谣这样写道：

兵农合一好，满地长的草，
吃死有钱的，穷人遭了殃，
常备兵开小差，国民党逃跑了。
鸡不鸣狗狂叫，村里只剩下老和少！

156 阎锡山为了给“兵农合一”擦脂抹粉，宣称：我们的征收原则是“除了我的，全是你的”，比列宁的征收原则“除了你的，全是我的”优越得多。“在地估量，在场登记，快割、快打、快交、快藏”，是他在这一时期征粮的实施办法，田禾长在地里就掌握了预产量，田禾登场就掌握了实产量，碾打之后，马上采用掠夺方法拿走粮食。大部分粮食拿走了，拿完了，甚至还不够，人民“快藏”什么呢？从“征一、购二、附加五、马料四”的征购数字来看，不说省的实际征购数字远远超过了这个规定，不说“派购”和“赊购”的数量，不说专区和县的杂派杂征，只说村吧，常备兵“卖兵粮”有多至20多石者，差款每户有多至10余石者，村行政费用、闾行政费用，连同一切苛捐杂税，叫人民倾家荡产沦落在死亡线上者，触目皆是。所以人民异口同声地说，除了你的，没有我的了！

三人小组编成、份地划定后，造好人营册，填好份地证，要

举行两个隆重仪式，一是入营仪式，一是授地仪式：

入营仪式：在入营大会上，除了领兵的致欢迎词，交兵的致欢送词以外，要求常备兵行列整齐、喜眉笑脸地接受各个国民兵领带的全体辅助劳力赠送的慰问品如鸡蛋、糖果、白蒸馍等等，最后举行会餐。大会的会场装潢得五彩缤纷，力求富丽，可是背面的镜头适成反比。被征的常备兵，没有一个是富有钱有势者的子弟，百分之百的是穷苦人民的子弟。他们懂得“为谁辛苦为谁忙”的道理，而且还在编组没有完全就绪的时候，接领新兵的部队早已分批光临，配合“国民兵团”实行武装接领，集中起来时的人身待遇是集中营式的军事管制，吃饭、出外、大小便，都有武装人员来“护理”。因此，要求常备兵行列整齐，喜眉笑脸，要求国民兵亲亲热热，送鸡蛋、塞白馍的真实景况是，常备兵东倒西歪，愁眉苦脸，“笑”成了泪人，只要举目一看，就有若干的泪脸进入你的眼帘。国民兵表情不是亲亲热热，而是冷冷淡淡，所拿的强制礼物，很少是白馍、鸡蛋，大多是祭品似的黑色蒸食和烙食。大会在明欢暗愁、强笑实哭的惨状下结束后，常备兵的家属和国民兵又展开了剧烈活动，这就是常备兵家属要优待粮，国民兵小组交不了，要的要要，没的实没，哭的哭，闹的闹，混作一团。县政府和国民兵团对这一纠纷的处理，恐怕各地都用同一的经验公式即一推二六五，一推推到村里，任务便告完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般地在入营后的一、二、三月之中，领兵部队的电报来了，长官部的电报来了，前者是说新兵跑了，要求抓补，后者是严加申斥，限期抓补，函电飞来，纷如雪片。接着，村里的报告也来了，措词虽然不同，问题则是一致：某部队把国民兵抓走了，说是常备兵跑了要叫国民兵顶补；某单位到村乱打乱闹，限期补送逃跑了的常备兵。人民逃避，干部躲

闪，村里闹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阎锡山接到部队、行政两方面互相控诉的报告，又颁下了一道命令。他说国民兵抓常备兵十拿九稳，部队抓逃兵十去九空，规定国民兵抓到在逃的常备兵，国民兵不再顶补；国民兵抓不到在逃的常备兵，由国民兵替补。命令到村，立即出现了两种现象：一种是民抓民你毒我恨，一种是民雇民卖兵风行。军队抓兵，国民兵抓兵，国民兵雇兵，三种活动交织在一起，农村成了漆黑的世界。

授地仪式：这个大会的动态，一般是阴沉沉的。因为大片地区的份地是明分暗不分，而且广大人民在阎伪统治下，负担繁重，差务繁多，就是缺田少地的贫苦人民当时也不稀罕那个份地。相反的，一般穷苦人民认为这只能是给富豪人家解决问题——减少富人们的地亩负担和差务负担。

上述这些事实，是我在中阳县当“组政经军统一行政委员会”（简称统委会）主任的时候亲自领导和亲眼看见的。

（赵一白）